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 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

韩献栋 赵少阳

【内容提要】 对冲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中小国家）为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包含一套混合、多元的政策组合的外交安全战略。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评估，对冲战略成为近年来韩国对华的主导战略。这一战略以积极接触为主，以分散投资、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为补充。但是这一战略并不十分稳定，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形态的影响，也受到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政治分化的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韩两国都需要思考如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保持稳定这一重要课题。为此，中韩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层面稳定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同时，还需要建立制度性战略沟通机制，培育互信，管控潜在的风险，以维护中韩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 对冲战略；威胁认知；积极接触；间接制衡；中韩关系

【作者简介】 韩献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少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生。（北京 邮编：100088）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1.03.006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1）03-0097-22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的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美国的盟友在中美之间如何行事，对日益发展的中国将会采取怎样的外交战略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韩国是中国周边国家，又是美国的盟友，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又与美国维持着紧密的军事安全关系。在中美总体处于战略合作的结构性环境下，韩国的这种“经中安美”战略尚有可舒适运行的空间，但随着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格局，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回旋余地和空间日渐局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制定对华战略就成为了相关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就韩国的对华外交战略而言，以车维德（Victor Cha）、韩硕熙（Han Suk-hee）等为代表的韩裔或韩国学者认为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是韩国对华战略的核心主导思想”。^①所谓接触战略，其主要特征是强调与崛起国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外交和经贸关系。^②与中国建交后，韩国不断深化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发展经贸关系，并在APEC、东盟10+3、G20等多边框架内加强了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在众多韩国学者看来，韩国的对华接触战略是成功的。

与“接触战略”这一概念相类似，韩裔学者康灿雄（David C. Kang）则用“容纳”（Accommodate）这一术语来概括韩国的对华战略。所谓“容纳”，即接受、认可、包容、便乘和利用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康灿雄认为，“从军事层面来看，韩国的战略与军事规划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经济上，中韩贸易额自建交后不断增长，中国迅速取代美国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的民调统计表明，韩国民众也对中国崛起持容纳态度。”^③

但是，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对于崛起的中国，韩国将会采取“制衡战略”，韩国将会加

① Victor Cha, “Engaging China: The View from Kore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33-51; Han Suk-hee,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4, 2008, pp.335-351.

② Derek McDougall, “Responses to Rising China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Soft Balancing with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1, No.73, 2012, p.4.

③ 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9, No.1, 2009, pp.9-13.

入美国领导的制衡同盟来阻止中国的崛起。^①同时，还有一些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应该采取扩大同盟网络与发展韩中关系的并行战略，主张韩国应该发展与美日的安全合作，并从中长期的角度考虑，发展与北约的合作，形成包括“欧盟—亚洲”的全球性安全网络。同时考虑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韩中贸易与投资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发展韩中关系。^②

多种主张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问题的复杂以及把握其实质的难度。然而，无论是“接触战略”“容纳战略”，还是“制衡战略”“并行战略”，笔者认为都难以概括当前韩国对华战略的全貌。“接触战略”“容纳战略”等概念抓住了韩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特征，却忽视了现阶段韩国对华战略中存在的防范、警惕等成分。“制衡战略”则与现阶段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状况明显不符。尽管韩国有一定的理由对一个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位于周边且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中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担心，^③但有韩国学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韩国并不是一个对华“制衡者”。^④而“并行战略”这一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韩国保守政府的安全战略形态，并没有准确反映出韩国进步政府的安全战略特征。

整体来看，笔者认为当前韩国的对华战略呈现出一种接触与防范并存的复合特征，一方面，虽然中韩两国关系受到了“萨德”事件的影响，但两国关系依旧处于良好的区间，这是中韩关系的主旋律。另一方面，韩国的现实政策也的确是明显增加了对华防范的成分。例如，文在寅总统在政府工作简报上就曾明确表示“韩国提出‘新北方政策’与‘新南方政策’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对华经济依赖，降低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⑤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이동선, <아시아의 미래 안보질서와 한국의 대응전략>, <EAI 국가안보패널 보고서: 2020 한국외교 10 대 과제>, 2012년, p.1. (李东善:《亚细亚的未来安保秩序与韩国的选择》,《EAI 国家安保报告书: 2010年代韩国外交十大课题》, 2012年, 第1页。)

② 남창희, 이원우, <한국의 동맹네트워크 확대와 한중관계 발전 병행전략: 전략과제 도출을 위한 시론>, <국제관계연구> 제 16 권 제 2 호 (통 관 제 31 호). pp.5-36. (南昌熙、李原宇:《韩国的同盟网络扩大与韩中关系发展并行战略: 为了得出战略课题的试论》,《国际关系研究》2011年第16卷,第2号,第5—36页。)

③ 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9, No.1, 2009, p.2.

④ Chung Jae-ho,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82, No.4, 2009/2010, p.671.

⑤ 《韩国青瓦台经济助理金显哲作简报》，青瓦台，2017年11月9日，<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454>；《文在寅总统主持首席秘书、助理会议并发表讲话》，青瓦台，2017年11月20日，<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558>。

在安全领域，韩国在维护韩美同盟的同时，积极推进国防改革，加强军备建设。韩国在安全领域推行的战略是否具有中国因素的考量？经济领域中对华便乘与防范的“双取向战略”反映了韩国怎样的心理？究竟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韩国的对华战略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韩两国又该如何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大多数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对冲”的战略行为来应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和中国崛起。在中韩关系和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领域，也有一些韩国学者开始使用“对冲”这一概念来描述现阶段韩国应对中国的战略选择。^①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的确产生了周边效应、世界效应，即周边国家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发展对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政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冲”这一概念本身所具有说明和解释能力。

在“中国崛起，这一描述中国不断增强的能力、影响力以及相关综合效应的术语，现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外交、文化以及军事现象”^②的背景下，韩国作为中国的一个邻国，作为美国的一个同盟国以及一个中等强国，它的对华战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虽然说上述三重身份加上“分裂国家”四重身份兼具使韩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又可以将韩国的对华战略形态与其他的中国周边国家、美国的同盟国以及中等强国分别进行比较，从而更有利于发现影响这三类国家对华战略制定的关键性变量，从这一角度而言，对韩国对华战略形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标本性意义和比较参照价值。

由于国际关系中的对冲概念仍处于未定型的概念化过程中，既有研究中依其建立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因此，本文将在梳理对冲概念的基础上，依据新的界定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韩国的对华战略进行分析，以便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韩国的对华战略形态及其本质。

① 代表性文章有 Han Suk-hee,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4, 2008, pp.335-351; Kim Min-hyung, "South Korea's China Policy, Evolving Sino-ROK Rel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n Security," *Pacific Focus*, Vol.31, No.1, 2016, pp.56-78。

② Chung Jae-ho,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82, No.4, 2009/2010, p.657.

一、对冲战略：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既有的对冲概念及分析框架

对冲（Hedging）原是一个金融学术语，是指一种旨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一般是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可抵的交易。冷战结束后，对冲思想开始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界，早期用以分析美国接触+遏制的对华战略。^①进入21世纪后，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被广泛应用于东南亚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以及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面临的选边困境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的分析上。

对冲是21世纪亚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②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以这一概念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的研究成果已不鲜见。但是，由于这一概念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中，不仅其定义存在着许多争议和模糊之处，依其建立的分析框架也各有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对冲战略本质上是一种混合战略（a mixed strategy），对冲国一方面寻求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与大国/崛起国接触以谋求利益，另一方面又同时采取一些防范性措施来减少或规避风险。马来亚大学的郭清水（Kuik Cheng-Chwee）就是如此界定对冲概念的代表性学者。他将“对冲”定义为“一国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背景下，通过寻求政策的多元化来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从而规避风险的行为。”^③中国学者史田一也认为“对冲战略是中小型战略行为体在高度战略风险驱使下，基于挑战的多元性和自身的脆弱性，综合多种相互补充的战略选项进行风险抵消与转化的战略行为。”^④

另有一些学者将“对冲”视为东亚中小国家所采用的折中安全战略，主要用于应对中国崛起或在中美大国竞争中保持动态平衡，目的在于减少在中美大国竞争中“选

① Zalmay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RAND Corporation, 1999, p.72; 同时，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中，对冲思想为美国小布什政府所采纳，从而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② John D.Ciorciari and Jürgen Haacke, “Hedg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3, 2019, p.368.

③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163.

④ 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84页。

边站队”或“押错马”的风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对冲是一组战略集合（a set of strategies），旨在避免国家不得不在制衡、追随、中立等直接战略中做出选择的情况。对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中间立场，可以阻止或避免国家必须选择一方而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①韩国学者韩硕熙认为随着中国的实质性崛起，韩国面临深刻的选边困境。自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韩国开始对华采取“软对冲”战略。通过这一战略，韩国希望同时维持与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相当狭义的对冲概念，将对冲严格限定在军事安全领域，认为对冲是一种结盟选择（alignment choice）。^③

在对冲概念上，学术界之所以存在不同的定义，主要是不同的国家因自身条件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采取的具体对冲政策的不同造成的，实践本身的复杂影响了对实践的概念化抽象。与对冲概念相关联，学术界关心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面对不同的具体实践形态，如何明确对冲国家？如何从经验上识别对冲行为，尤其是如何区分制衡行为与对冲行为？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普适性的分析框架。^④只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分析框架，对冲概念的提出才会具有实际的意义。为了研究对冲行为，中国台湾学者陈宗严（Ian Tsung-Yen Chen）和杨昊（Alan Hao Yang）在他们的研究中，以东南亚国家为案例，提出了威胁认知—经济预期的对冲分析框架。

陈宗严和杨昊将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划分为四个象限，认为东南亚国家可以根据对中国威胁感知程度（高HT或低LT）以及对中国积极或消极的经济预期（PE或NE）进行分类。所谓对冲国家是指那些HT—PE型国家或LT—NE型国家。^⑤中国大陆学者王栋也提出了类似的分析框架，他将对冲战略视为一种策略集合，认为不同国家对冲战略之间的差异性取决于威胁认知与相对能力两个变量。“威胁认知越高、相对能力越高的国家，其对冲强度越高，对冲战略的表现形态中诸如防范、牵制、制

①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Policy Studies* 16,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5, p.viii.

② Han Su-kee,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 and South Korea’s Soft Hedging,” in Emile Kok-Kheng Yeoh, ed., *Towards Pax Sinica? China’s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9, p.49.

③ Darren J. Lim and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24, No.4, 2015, pp.709-725.

④ Charles Chong-Han Wu, “Why Do States Hedge in East Asia? An Empirical Study on Hedging,” *Asian Perspective*, Vol.43, No.3, 2019, pp.57-58.

⑤ Ian Tsung-Yen Chen and Alan Hao Yang, “A Harmonized Southeast Asia? Explanatory Typologies of ASEAN Countries’ Strategi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26, No.3, 2013, p.265.

衡等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①

与陈宗严和杨昊、王栋采用双变量建立分析框架不同，郭清水则更加看重威胁认知单一变量在分析对冲行为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要东盟国家没有感受到明显且急迫的直接威胁，那么对冲行为就是东南亚中小国家的普遍理性选择。^②在此基础上，郭清水提出了一个便于操作化的对冲战略分析框架。他认为对冲战略的手段大致可以划分为回报最大化（Return Maximizing）与风险应急（Risk Contingency）两类选项。郭清水强调，一般而言，只有当国家同时使用回报最大化与风险应急战略箱中的手段时，其战略才可称之为对冲战略。

（二）本文的对冲概念与分析框架

表1是参考约根·哈克（Jürgen Haacke）的研究成果制作的对冲概念的比较。由于其本身的模糊性，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了不止一个对冲概念，而相互之间又存在着许多共性。^③

表1 对冲概念比较

作者	对冲是一种管控风险的手段	对冲是中小国家所使用的独特安全战略	对冲是一种安全联合行为（alignment）或对冲安全联合的风险	对冲是一种混合的政策（通常是经济和安全层面的）
吴翠玲	是	是	否	是
郭清水	否	是	否	是
林姆与库珀	否	否	是	否
史田一	是	是	否	是
王栋	是	否	否	是
李知允	是	是	否	是

资料来源：本表是参照约根·哈克的相关研究制作而成。详见：Jürgen Haacke,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for A Modifi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3, 2019, p.380.

①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35页。

②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0, No.2, 2008, p.164.

③ Jürgen Haacke,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utheast Asia: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for a Modified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3, 2019, p.380.

由表1可见,大部分学者认为实施对冲战略的目的在于管控风险,实施的主体主要是中小国家,而实施对冲战略所涉及到的领域既包括安全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基于从上述学者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笔者认为定义“对冲”概念需要考虑对冲行为的实施目的、实施主体的特征与战略位置以及对冲战略的实施手段这四个方面的因素。从目的上看,实施对冲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或抵消行为体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风险与威胁。从主体特征看,由于大国行为体具有更大的抵御威胁、不确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因而,实施对冲行为的主体更多的是中小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国行为体不会采用对冲行为。从战略位置来看,对冲是一种介于制衡战略与追随战略之间的模糊战略。从使用的对冲手段而言,对冲国往往会采用混合战略或多元化的手段。考虑这些因素,本文将“对冲”定义为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为了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包含一套混合、多元的政策组合的外交安全战略。

在明确对冲国家的身份或识别对冲行为时,威胁认知被大多数学者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依此或合并其他变量建立分析框架。然而,虽然大多数学者认识到了威胁认知这一变量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对这一变量的系统分析。首先,多数学者没有提出衡量国家威胁认知的具体方法。其次,既有的关于对冲战略的文献对威胁认知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威胁程度这一维度上,缺少对威胁类型认知这一维度的分析。而实际上,威胁类型的认知对于对冲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威胁类型认知决定国家对冲战略手段的组合选择。一般而言,威胁类型可分为经济威胁、政治威胁、文化与意识形态威胁、军事安全威胁及其组合而成的复合威胁。不同的威胁类型认知决定着对冲国会采取不同的对冲政策。而威胁程度的认知决定着对冲政策的强度。纯制衡与纯追随之间的范围是对冲政策的适用区间,当一个国家对目标国的威胁程度认知高,该国的对冲政策便趋向于制衡战略。当一个国家对目标国的威胁程度认知低,那么该国的对冲政策则趋向于追随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纯制衡、纯追随、对冲,还是经济威胁、政治威胁、文化与意识形态威胁以及军事安全威胁,这些政策类型和威胁认知类型的划分都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而进行的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操作,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如此纯粹而界限分明的类别划分。“有效的对冲战略需要准确的评估风险”,^①如此操作,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能使我们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复杂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基于如上的考察与分析,

① John D. Ciorciari, “The Variable Effectiveness of Hedg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9, No.3, 2019, p.3.

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民调数据等来考察与测评韩国对中国威胁认知的类型及其程度。尽管中韩两国政治体制不同,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各异,但并未发现有任何政治、学术以及社会民调等方面的信息显示韩国在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感知到了来自于中国的威胁,因而以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与军事安全两个领域。

(一) 经济领域

依照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9年韩国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市场分别为中国大陆、美国、越南、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印度、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主要的进口市场有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越南、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中国既是韩国最大出口市场又是最大进口市场的状况已经连续存在了多年。2019年韩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出口占据了其整体出口的31%,进口的21.65%。

韩国在进出口市场方面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一些警惕。有韩国学者认为,“对于韩国来说,中韩两国不断拓展双边经贸关系的未知在于:中韩迅速增长的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彼此间的不对称依赖,特别是当另一方有可能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时候。”^①因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韩国对外贸易的脆弱性远高于中国。这种状况使得韩国学界开始担忧中国有可能会将中韩不对称的贸易依存度作为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

警惕不仅仅存在于韩国学术界,同时也存在于韩国政府和民众的认知中,甚至在表达上更为直接。2017年11月9日,文在寅总统的经济辅佐官金显哲在一份政策简报上指出:“韩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韩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不大,但却相当于中韩贸易额(2016年2114亿美元),这么做,既可以说是开拓替代中国的新市场,也可以说是为了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②文在寅总统对这一观点也没有避讳。2017年11月20日,文在寅在访问东南亚国家之后举行的青瓦台首席秘书会议上明确表示,“新南方政策”的意图是“促进与东盟的交流,使出口市场实现多元化,进而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③

韩国民众对因韩国对华经济依赖而产生的威胁认知也颇为强烈。2014年由韩国峨

① Chung Jae-ho, “Korean Views of Korea-China Relations: Evolving Perceptions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Asian Perspective*, Vol.36, No.2, 2012, p.220.

② 《韩国青瓦台经济助理金显哲作简报》,青瓦台,2017年11月9日,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454>。

③ 《文在寅总统主持首席秘书、助理会议并发表讲话》,青瓦台,2017年11月20日,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558>。

山政策研究院发布的民调报告显示，“近年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作威胁的韩国民众大幅度增加。71.9%的韩国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韩国的经济和就业构成了威胁。不同意该看法的占比只有18.7%。”^①从民调统计情况来看，一些韩国民众之所以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持担忧心态，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一是认为中韩之间的技术差距正在缩小，两国经济关系开始由互补性向竞争性转变；二是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挤占了韩国的工作岗位。^②由中国社科院主持的民调报告也显示，有45.2%的韩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于韩国来说威胁与机遇并存。部分被访的韩国民众担心，过于依赖中国经济会导致韩国在中韩关系中丧失发言权。^③

综合来看，在经济领域，韩国明显而直接地感知到了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威胁。就威胁感知的产生原因而言，一是因经贸关系上的单向高度依赖而产生的威胁感知，二是因经济关系的竞争性日渐增强而产生的威胁感知。第一类可称之为“依赖性”威胁感知，第二类可称之为“竞争性”威胁感知。这两类威胁感知的主体是不同的，“依赖性”威胁感知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而“竞争性”威胁感知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和民众。

（二）军事安全领域

在经济领域，无论是韩国民众、学术界，还是政府，对于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或中国的经济威胁都存在着一种直接的感知。但是，在军事安全领域，政府与以学术界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则是有所不同的。

从政府层面看，虽然韩国认为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俄日两国为了扩大影响力也正在竞争性地增强以海空军为主的军事力量。这种安全局势，加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变数，进一步加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④但韩国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家实力的增长对其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安全威胁，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对中国加强国防能力建设等军事动向表现出“强烈的忧虑”。^⑤在韩国国防部每两年一次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关于中国的叙述都是将其置于“东北亚

① Kim Ji-yoon et al., “South Korean Attitudes on China,” The Asan Institute, 2014,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south-korean-attitudes-on-china/>.

② Kim Ji-yoon et al., “South Korean Attitudes on China,” The Asan Institute, 2014,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south-korean-attitudes-on-china/>.

③ 王晓玲：《韩国人的中国观》，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9—114页。

④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OK, 2018 *Defense White Paper*, 2018, p.11.

⑤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Japan, 2019 *Defense White Paper*, 2019, p.5.

安全形势”这一节中，基本是对中国的国防政策及动向的事实性描述。

从韩国《外交白皮书》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的身份定位近十年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均是将中国定位在韩国需要重点开展外交关系的“周边四强”之一。^①在专门阐述中韩关系的篇章中，韩国政府主要强调的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在朝核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中韩高层领导间的会晤次数、内容以及中韩之间不断上升的贸易额与人文交流往来等。

但是，没有感知到中国崛起对其安全所产生的直接威胁并不意味着韩国完全不担心中国崛起对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和中韩实力不对称程度的拉大在客观上使韩国产生了一些担忧；另一方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所谓的中国“外交强势”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韩国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认知。当然，这种担心和认知主要是通过学术界来表达的。所谓的“朝鲜问题”是一个包括朝鲜核问题、朝美朝日双边关系正常化、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以及南北关系与半岛的统一等问题在内的问题群（issue area）。在“朝鲜问题”上，韩国追求对其解决进程的主导，并希望中国能够在政策和步调上与其保持一致，一旦出现不一致，韩国就会感到不满，乃至产生怀疑和担心，有个别韩国学者甚至认为“朝鲜问题”将会是引起中韩两国未来摩擦的首要问题。^②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互动，也使韩国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心。在不少韩国学者眼里，中国外交越来越强势，甚至有点“咄咄逼人”（aggressive）。^③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官方正在向周边中小国家传递警告信号（a much clear warning）。这一表态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④此外，由于中韩两国的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区域，各自认为在己方防空识别区内进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可能是在重叠区域内进行，从而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不满。2018年韩国就认为中方军机没有事先通报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引起地区紧张，并向中国驻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OK, *2018 Diplomatic White Paper*, 2018, pp.18-19.

② Chung Jae-ho, “Korean Views of Korea-China Relations: Evolving Perceptions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Asian Perspective*, Vol.36, No.2, 2012, p.229.

③ Kim Ji-young and Kim Ae-kyung, “China’s Aggressive Periphery Diplomacy and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s,” *The Pacific Review*, Vol.31, No.2, 2018, p.268.

④ Lee Jeong-seok, “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 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p.2.

韩武官处提出了抗议。^①

但是，无论是中国外交上的“强势”，还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独立态度和政策以及中国军机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所谓“越界飞行”，虽然韩方都在安全上感到了某种程度的“不适”，但这种“不适”并不是直接的安全威胁感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不一致更多的是一种“软性冲突”（soft clashes），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有限且在性质上并不严重。^②这使得韩国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安全威胁认知只处于“不确定性”的范畴内，还没有达到日本的“强烈忧虑”的程度，属于一种间接的且程度较低的安全威胁认知。

韩国之所以在政治安全领域，对崛起的中国持一种间接且程度较低的威胁认知，主要原因是韩国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心态尤其突出。”^③领土主权争端比较敏感，涉及国民感情，使得各国政府在解决领土争端时面临着内外双重压力。^④而且，领土争端博弈往往带有“零和”性质，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稍有不慎便会引起冲突。因此，“在领土划界这一敏感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更有可能对崛起的中国保持警惕。”^⑤

三、韩国对华战略的政策组合

认知影响乃至决定着政策选择。从如上的分析可知，韩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存在着直接且程度相对较高的威胁感知，在军事安全领域存在着间接且程度较低的威胁感知。这些心理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韩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就经济领域而言，无论是“依赖性”威胁感知，还是“竞争性”威胁感知，其同时存在的另一面则是韩国在经济上从中国获利的事实，因此所谓的“威胁感知”更多是一种基于获利前提下对获利机会的可能减少或失去的一种担忧。事实上，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发展正处于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得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韩

①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OK, *2018 Defense White Paper*, 2018, p.15.

② Min Ye,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Politics Nexus in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51, No.1, 2015, p.104.

③ 高程：《周边环境变动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第38页。

④ 凌胜利：《二元格局：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4期，第75页。

⑤ Chung Jae-ho,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82, No.4, 2009/2010, p.670.

国在中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8年中韩贸易总额为3144亿美元,韩方贸易顺差高达958.87亿美元。^①中韩贸易占据了韩国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便乘中国的发展,韩国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就军事安全领域而言,尽管韩国并没有感知到来自于中国直接的军事安全威胁,但由于韩国处于韩美同盟以及东北亚安全体系的结构之内,其军事安全政策既受到韩美同盟的制约,又受到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因韩美同盟的存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韩国的政策。在东北亚地区层次,朝核问题的存在与南北关系的不稳定,与日本存在的领土和历史问题争端以及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存在着的军备竞赛等因素也都在影响着韩国的军事安全政策。

上述这些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韩国需要应对与管理的外部环境,影响着韩国的对华政策。为此,韩国采取的是一种由一套综合性政策组合而成的对冲战略。这一政策组合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推进包括政治、经济乃至安全上的积极接触政策;第二,促进投资与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政策;第三,军事安全领域的间接制衡政策。

(一) 积极接触政策

所谓接触政策,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战略互动的过程(strategic interaction),指发起国运用非强制性的外交手段和举措,引发目标国的合作行为并进一步发展为互惠互利关系的外交准则。^②积极接触是韩国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政策手段,也是韩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韩国就一直采取这一战略。^③

韩国的对华接触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其中经济是对华接触政策效果最为明显的领域。1992年中韩建交时,两国的贸易额只有82.18亿美元,到2018年两国的贸易额正式突破3000亿美元。^④自2004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韩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2015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② Victor Cha, "Engaging China: The View from Kore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37.

③ Lee Jeong-seok, "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 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2, p.11.

④ 《中韩经贸合作简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年2月11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jiguanzx/201902/20190202833671.shtml>。

年中韩两国签署了《自贸协定》，该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 17 个领域。经过过渡期，中方实现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的 91%、进口额的 85%，韩方实现零关税的产品将达到税目的 92%、进口额的 91%，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中韩《自贸协定》的签署对于从制度层面稳定和推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016 年曾发生“萨德”事件，但中韩贸易事实上并未受到多少影响。在投资领域，截至 2018 年底，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812.7 亿美元，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

在政治领域，韩国与中国关系的定位经历了友好合作关系、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阶段性关系定位。通过不断升级的关系定位，双方由首脑会晤、高层会谈与交流、政党交流、立法机构交流等构成的政治交流与合作关系得到了稳定、顺利地发展。^①

相对于政治关系的发展，中韩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启动较晚。1998 年双方启动了高层军事交流，2008 年开通了作战司令部级军事热线，2014 年又开通了国防部间军事热线。这些措施对两国军事信任关系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就两国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情况而言，韩国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势。1998 年以来，中国军方高层访韩 13 次，而韩国军方高层访华达到 30 余次。

（二）投资与出口市场多元化政策

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中韩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为韩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两国技术水平日渐接近、产业结构趋同等因素也使韩国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出口市场上对华过度依赖也使韩国感到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威胁。为了缓解这种压力，韩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在对外投资领域采取了区域多元化战略。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提出“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加强了与俄罗斯等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国、美国和东南亚是韩国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从 2005 年起，韩国对中国的累积直接投资一直位列首位，但从 2017 年起，韩国在美累积直接投资额超过在华投资，2018 年达到了 940.6 亿美元。而到 2018 年，韩国在东南亚的累积直接投资也达到了 807.3 亿美元，接近了 812.7 亿美元的在华累积直接投资额度。“新北方政策”提出后，韩俄两国加快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进程，

^① 中韩两国自建交以来的首脑会晤、高层会谈与交流、政党与议会交流以及韩国政治代表团访华的情况，参见韩国驻华大使馆官网，http://overseas.mofa.go.kr/cn-zh/wpge/m_1224/contents.do。

2019年6月两国启动了服务投资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同年10月又进行了第二次磋商。^①

分散投资、降低单向依赖是韩国政府的主要考虑。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院长李载荣就曾表示“韩国政府目前正在推行的‘两新政策’,其中就有降低对华依赖、分散风险的考虑。”^②韩国前驻日本大使申珏秀也曾提出,“为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市场,韩国有必要效仿日本的‘1+1战略’,即每在中国进行1份投资,就在中国之外的地区也进行另外1份投资。”^③

除分散投资外,韩国还加快了签署双边自贸协定的步伐,通过贸易的多元化来降低对主要出口市场的依赖。截止到2016年7月,韩国签署生效了15份包括53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文在寅政府上台执政后,韩国又分别于2018年2月、2019年8月与中美洲五国(巴拿马、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英国签署了自贸协定,与以色列、印尼的自贸协定磋商已经结束,并开始了与菲律宾、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的磋商。^④

(三) 间接制衡

间接制衡是一种通过与他国建立或升级安全防务伙伴关系并强化自身军备以降低安全威胁的政策手段。韩国一直与美国保持着军事同盟关系,并不断加大国防预算投入。虽然从韩国政府的公开立场看,维持韩美同盟、推进国防改革以及加强国防建设主要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导威胁,但由于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等因素,韩国的同盟战略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客观上也具有间接制衡中国的政策考虑。虽然韩国政府并没有公开这样主张,但一些韩国学者直接表达出这种认识。李吉允(Lee Ji-yun)认为韩国的对冲策略兼具两个面向:一方面韩国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军事上牵制中国(hold China in check);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⑤韩硕熙也认为

① 김영옥, <한-러 서비스 투자 FTA 협상전략과 전망>, 한국대의경제정책연구원, 2019년, p.1.(金英玉:《韩俄服务投资 FTA 协商战略与展望》,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2019年,第1页。)

② 《韩经济智库掌门:韩中合作应借势半岛春风再扬帆》,韩联社,2018年12月27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224000100881?section=interviews/index>。

③ 《韩国应避免美中一边倒外交 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韩国中央日报,2017年4月6日, https://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65421&category=002002。

④ 详见:韩国 FTA 网站, <http://www.fta.go.kr/main/situation/kfta/ov/>。

⑤ Lee Ji-yun, “Hedging Strategies of Middle Powers in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East Asia*, Vol.34, No.1, 2017, p.2.

韩国对华对冲战略的一大支柱是软制衡战略，为了中和中国对朝鲜半岛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韩国需要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同盟关系。^① 崔康（Choi Kang）则明确主张，“韩美同盟应该不断加强。从韩国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考虑朝鲜以外邻国的潜在威胁，即使朝鲜的威胁减少，美韩同盟仍然是有效的威慑力量。因此，韩国需要考虑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角度加强美韩同盟。”^②

在维持和强化韩美同盟的同时，自 21 世纪初开始，韩国还将实施国防改革和推进国防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战略。2006 年卢武铉政府制定了《国防改革 2020 计划》，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又制定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09～2020）》和《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2013 年上台的朴槿惠政府制定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4～2030）》，而文在寅政府执政后又制定了《国防改革 2.0》。韩国推进国防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革指挥结构、军种结构和军队的运行体制，加大新型武器的购置，实现可主导应对全方位安全威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精锐化军队的强军目标。^③

与国防改革同时推进的是国防的现代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18 年韩国的国防开支位列全球第 10 位，与上年相比增长 7%，达到 43.16 万亿韩元（约 396 亿美元）。2020 年韩国的国防预算则达到 50.15 万亿韩元（约 493 亿美元），与 2019 年相比增长 7.4%。^④ 在大规模的国防预算中，对美国先进武器的采购占据了重要比例。长期以来，韩国一直是美国的第三大军火采购伙伴国。近年来，韩国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包括 40 架 F-35A 隐型战斗机、无人侦察机“全球鹰”（Global Hawk）、海上作战直升机“MH-60R”、兼具监视和攻击功能的雷达系统“Joint STARS”等。^⑤ 此外，韩国还从欧洲空客公司进口了 A330 MRTT 型空中加油机。有韩国媒体表示，“进口空中加油机大幅度提高了韩国空军的作战执行能力。韩国空军最新战斗机 F-15K 从大邱基地出击飞到离於岛（苏岩礁）上空最多仅可停留 20 分钟，

① Han Suk-hee, “From Engagement to Hedging: South Korea’s New China Policy,”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20, No.4, 2008, p.345.

② Choi Kang and Shin Beomchul, “The U.S.-North Korea Summit Evaluation and South Korea’s Security Concerns,” The Asan Institute, June 22, 2018, <http://en.asaninst.org/contents/the-us-north-korea-summit-evaluation-and-south-koreas-security-concerns/>.

③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of ROK, *2018 Defense White Paper*, 2018, p.38.

④ 《韩国 2020 年国防预算同比增长 7.4%》，人民网，2019 年 12 月 12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9/1212/c1011-31503094.html>。

⑤ 《韩国成近十年美制武器第三大买家》，韩联社，2019 年 1 月 23 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123003500881>。

几乎无法展开有效的空中作战。然而,如果可以得到空中加油,在离於岛(苏岩礁)的作战时间可以延长到80多分钟。”^①韩联社也表示,“韩国国防部计划引入4架加油机为战机续航,其目的是更有效地应付外机擅闯防空识别区等偶发事态。”^②

对华积极接触、促进分散投资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是韩国在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和环境下,综合考虑经济、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统一问题等因素后做出的综合政策组合。在部分军事主权尚为美国掌控的附属性同盟结构下,只有积极推进对华的政治军事接触,才会尽可能消除韩美同盟对中韩政治安全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韩国政府以推进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为契机,将韩美同盟向平行性同盟转型的战略也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以展示其更高层次的国防自主能力。在经济领域,促进分散投资和出口市场多元化的举措实际上是在中韩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以及中美产业和技术竞争的大背景下,继续保持并推进中韩经贸关系的一种补充和预备之策,其目的是在保持乃至扩大现有在华经济利益的前提下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四、对华对冲战略与中韩关系

由于东亚国际体系的转型以及中美关系进入长期战略竞争阶段,因而,对韩国而言,东亚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的国际环境都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的还有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分裂国家”的身份以及追求实现民族统一的国家战略。这些构成了影响韩国制定对华战略的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决定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冲战略将会是韩国对华的主导战略。就对冲的强度和形态而言,目前韩国的对华对冲战略是一种“软性对冲”,其主要特征是以经济、政治与军事安全领域的积极接触为基调,以投资贸易多元化和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为补充。

韩国的对华对冲战略与中国稳定周边的战略形成理性对接使得中韩关系在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尽管如此,中韩关系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因素或潜在的挑战因素,需要两国给予充分地重视和妥善的应对。首先,对中韩关系稳定构成最大威胁或干扰的因素

① 《愿空客空中加油机为军方恢复公信力带来转机》,韩国中央日报,2015年7月1日, https://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37381&category=002005。

② 《韩军接收第二架空中加油机》,韩联社,2019年3月27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327003500881?section=news>。

来自于美国。中美关系状态、美国的对华政策会直接影响到韩美同盟的发展形态，进而影响到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回旋空间会越来越小，甚至会直接面临选边站队的困境。“萨德”问题就对中韩关系造成了直接影响，“创伤”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近期，美国积极推进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是否在东亚部署路基中程导弹的动向，都值得中韩两国高度重视。其次，韩国国内政治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韩关系的稳定构成挑战。韩国进步与保守势力在韩美同盟、对朝政策、朝鲜半岛统一等问题上的立场大有不同，而韩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态势，进而影响到中韩关系。2017年文在寅政府上台后，调整了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时期的外交安全政策，做出了“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的反导体系，不发展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所谓“三不”承诺。在对朝政策上，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改善对朝政策，停止或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启动半岛和平进程，大大缓解了朝鲜半岛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为制止中韩关系继续滑坡、稳定中韩关系创造了条件。

从国际体系和结构性视角看，要稳定中韩关系，管理和化解中韩关系所面临的或潜在的挑战因素，处理与管理好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可使韩国免去“二强择一”的尴尬与窘困，从而也会为中韩关系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但问题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从双边关系层面入手稳定中韩关系，也许这才是目前我们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中国能够从双边关系层面处理好与美国的各盟国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于构建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也是极有帮助的。

对于中韩关系而言，首先需要稳定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这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国为其提供的巨大经济利益和价值是韩国考虑其安全战略与韩美同盟问题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韩国加大了对美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这其中既有产业转移方面的因素，又有投资环境变化方面的影响。面对产业升级换代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中韩需要提升两国的经贸关系水平，一方面应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的谈判进程，在稳定的基础上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可适当加大对韩国的投资，强化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从长期来看，需要将安全问题与经济合作问题分开处理，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增长，并持续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利益和价值。

其次，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韩需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这是中韩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合作的基础。夯实这一基础，

推进在这方面的合作，无论是对中韩关系的稳定，还是对朝鲜半岛地区的稳定，都至关重要。朝鲜核导问题的存在一直是美国和韩国保守势力强化韩美同盟的理由和借口，而在美国日趋将同盟资产用作围堵与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的情况下，只有继续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才能使韩国在强化韩美同盟问题上保持谨慎，继续其在安全领域的软性对冲政策。因此，中韩两国需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形成制度化的沟通磋商机制，密切和加强高层间的沟通与磋商，增进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继续推进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进程，降低韩国对美国以及韩美同盟重要性的认知，以使其安全战略和政策更为均衡。

最后，中韩两国还需要在其它“低政治”领域加强合作。在人文、教育、文化等领域继续推进合作的同时，还可积极推进和加强在绿色增长、智慧城市建设、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官方发展援助等领域的合作，推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的对接。早在2019年11月初，美国与韩国就在美国“印太战略”与韩国“新南方政策”的对接上发布了联合清单，^①2020年8月，双方启动了“印太战略”——“新南方政策”对话机制。而在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当天，美国国务院就再次发布了与韩国共同合作推进“印太战略”与“新南方政策”的合作方案，双方将要推进在基础设施、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的合作。^②在美国全方位加强与韩国关系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在如上，甚至更广泛的领域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进一步稳定两国的经济关系、密织人文纽带和巩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五、结论

韩日同为美国的东亚地区盟友，但是，两国的对华战略却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与主要表现为制衡特征的日本对华战略相比，韩国的对华战略更多地呈现出对冲的特征。中韩两国无领土争端、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韩国“分裂国家”的身份特质以及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问题上两国所具有的共同利益等因素使韩国的对华战略呈现出

① “Joint Fact Sheet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ew Southern Policy an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November 2, 2019, <https://2017-2021.state.gov/joint-statement-by-the-united-states-and-the-republic-of-korea-on-cooperation-between-the-new-southern-policy-and-the-indo-pacific-strategy/index.html>.

②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Working together to Promot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the New Southern Policy,”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state.gov/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korea-on-working-together-to-promote-cooperation-between-the-indo-pacific-strategy-and-the-new-southern-policy/>.

如此的特征。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状态，它会受到美国的对华战略以及韩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美国强化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态势下，它会要求甚至强迫韩国加入这一行列，这种情势如果与韩国国内政治的左右分化形成合拍，韩国就有可能对中国采取“硬对冲”乃至制衡的战略。

2020年10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日本正式举行会议，建立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此后，将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纳入这一机制的所谓“QUAD+”的声音一直未断。拜登政府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机制，在2021年2月举行四国外长会议之后，又于3月12日举行了四国首脑视频会议。但是，至今美国还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向韩国提出加入该机制的问题。3月18日在首尔举行的美韩外交、国防部长“2+2”会议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拜登政府上台执政不久，需要时间清理特朗普政府留下的内外乱局，也需要对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对外战略进行评估和重新设定。3月2日，拜登政府发布了《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针》，在明确界定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的同时，还表示欢迎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和防扩散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①拜登政府的这种定调使中美关系暂时进入了一个有可能可以重新建构的窗口期，拉韩国加入四国机制的紧迫性暂时降低；二是考虑到了韩国的国内政治状况和文在寅政府的谨慎态度。目前韩国已经进入了下一届总统大选期，左右势力竞争日趋激烈，政治情势微妙，向韩国施压有可能会影响到韩国政治，使选情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同时，文在寅政府在加入针对性和指向性十分明显的四国机制问题上也持谨慎的态度。这些因素使得拉韩国加入四国机制的问题仍处于学界和舆论试探的阶段。但是，拜登政府从双边层面强化与韩国同盟关系的措施从上台之日就已开始，拜登政府执政后不仅快速与韩国就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问题达成协议，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的外交首秀也放在了日韩之行上，而且美韩双方还就扩大同盟合作达成一致。^②对韩国外交安全战略方向影响力的竞争已经成为中美的战略竞争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主要表现之一。

从结构性视角看，管理好中美关系对于中韩关系的稳定十分重要，但是，在中美

^①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March 2021, p.21.

^② “U.S.-ROK Alliance-Expand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ch 2021, <https://www.state.gov/u-s-rok-alliance-expanding-bilateral-cooperation-for-the-21st-century/>.

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甚至在未来数十年内都会成为一种常态的情况下，中韩两国都需要考虑如何尽量屏蔽不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影响，设定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从而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为此，中韩需要以升级《自贸协定》为契机，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稳定和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情况下，需要深挖两国合作的潜力，力保各自的经济增长。在政治安全领域，需要进一步强化两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为此，两国应该建立制度性的战略沟通机制，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加强沟通，培育互信，管控潜在的风险，以维护双边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2020年11月25日至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韩国，双方达成了10项共识，其中包括成立“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以对未来30年的中韩关系进行规划、启动中韩外交安全“2+2”对话、尽早达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协议、早日出台《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以及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和韩国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①这些共识的务实推进将有助于降低美国和韩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也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韩国的对华政策和中韩关系。

【收稿时间：2020-12-01】

【责任编辑：程多闻】

^①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会谈达成10项共识》，中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d/t1835759.shtml>。

that the original system has not been able to adequately satisfy. With its innovations in financing condi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the AIIB better caters t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providing new options for them to develop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ir economy. The projects implemented by the bank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ocal infrastructure and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system.

【Key Words】 the AIIB, international system,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normative influence

7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Strategic Stability

by Zhang Huang & Du Yanyu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hink of strategic stability mostly with reference to nuclear weapons, but not to developments in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cyber, space and unmanned equi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 (AW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t defines the AWS from three aspects: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analysis, autonomous command and formation, and autonomous firepower attack. It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AWS competition by the world's major military powers, technological latecomers, and non-governmental actors, and examines the AWS challenge to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erms of crisis stability and arms race stabi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AWS is likely to strengthen first-strike advantages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accidents and "accidental escalation," which further reduces stability in a crisis.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low threshold of proliferation, the non-transparent R&D process, and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s about the AWS, the AWS arms ra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In order to meet the AWS challenge to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rms control and crisis management of the AWS under the UN framework, enhance strategic mutual trust with major countries that have ASW technolog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governance network to maintain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of the AWS.

【Key Words】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 strategic stability, crisis stability, arms race stability, strategic mutual trust

97 South Korea's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edging

by Han Xiandong & Zhao Shaoyang

【Abstract】 Hedging refers to a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strategy that includes a set of

mixed and diversified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state actor (mainly small and middle powers) in response to perceived threats and uncertainties. Based on an evaluation about it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hedging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strategy for South Korea to cope with China's rise in recent years. The South Korean hedg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primarily uses active engagement, and is supplemented by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 and export market and indirect balancing in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alm. But this strategy is not very stabl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e evolving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in South Korea. A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more pronounced, both China and South Korea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keep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s stable as possible without being affected by China-US relations. To this end, China and South Korea not only need to further stabilize and enhanc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through institutionalization, but als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push forward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 peace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establish regul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to foster mutual trust and manage potential risks so as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hedging strategies, threat perception, active engagement, indirect balancing, China-South Korea relations

11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Green New Deal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s Green Transition

by Li Kunze & Qi Kai

【Abstract】 As a brand-new concept for development, the "Green New Deal" mainly refer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a green economy. It is a relatively radical concept that eme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6. Since its embrace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2018, it has become the key framework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economic recovery and other issues. This has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main election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But this is also a cho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o make in trying to achieve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and regain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ost. 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the "Green New Deal" are not good. Given the powerful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traditional energy and the uniqu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en New Deal" may drag down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elections.